

我党第一支武装力量诞生记

□ 黄 河



1924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军阀、商团的骚扰，让广东革命政权内部危机严重。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1月中旬，经过改组扩充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正式成立，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建设和掌握的武装力量，也是之后被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大革命高潮中诞生

1924年8月，广州商团武装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给大元帅府的安全造成极大压力。广州商团原是辛亥革命后广州商会建立的商人自卫组织，后来发展为维护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部和英国军舰，也公开为广州商团助威。

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果断采取措施，下令镇压广州商团的叛乱。10月15日，孙中山调集黄埔学生军和滇、桂、湘、粤各军，分5路向广州商团武装发动进攻。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与指挥了这场平叛作战。经此一战，周恩来认识到建立党领导的军队的重要性。孙中山曾组建一支铁甲车队，但这支车队一直以来表现不佳。周恩来便向孙中山建议，可以改组扩充铁甲车队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1月中旬，经过改组扩充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正式成立。此时，孙中山已经离开广州，铁甲车队队员的配备与调动，由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周恩来亲自选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铁甲车队队长、副队长和军事教官。铁甲车队的党代表和政治教官分别由中共广东区委选派的廖乾吾、曹汝谦担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的大元帅府旧址



铁甲列车局部外形

任。中共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100多名队员，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

此外，周恩来找到黄埔军校的苏俄顾问进行协调，从苏俄援助黄埔军校的大批武器中，分出100多支日造“三八式”步枪、10支德造驳壳枪和3挺手提机枪给铁甲车队。同时，还为铁甲车队配备一列加装铁板的5节车厢铁甲列车，车厢两侧有不同高度的扁形射击孔，可多种姿势向外观察、射击。最后一节车厢装有3个旋转炮塔，每个炮塔上装备一挺重机枪。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先进的装备。

铁甲车队官兵的服装沿用了黄埔军校的军装式样，冬季着装是大檐帽、黄色或灰色中山装，打绑腿；士兵穿草鞋或布鞋，军官穿皮鞋或长筒马靴。铁甲车队名义上属于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正规的革命武装力量。

我党建军的初步尝试

铁甲车队从成立之初，便非常重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

进行政治训练是与旧军队的主要区别，主要由曹汝谦负责。他每天利用2小时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情况、当前国内外形势等，晚上组织小组讨论。后来，廖乾吾、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也承担起讲课任务。他们经常找队员谈心，对有思想问题或犯错误的队员不采用旧军队中通行的惩罚措施，

而是注重说服教育和启发引导。整个队伍气氛融洽，上下都很团结。

铁甲车队的军事训练基本参照黄埔军校的模式，按照正规阵地攻防战开展。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人在黄埔军校学到的知识，在军事训练教学中有了用武之地。军事训练课目主要包括步枪射击、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单个动作、夜间动作和排、连规模的战术演练等。除一般共同课目训练外，他们还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接受程度的队员因材施教，提高队员的军事技能。通过正规系统的教学与训练，队员们政治素质和训练水平提高很快，许多队员都成了后来各地开展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

铁甲车队的伙食费、办公费与杂支费等开支账目采取民主管理，每月定期公布。队长、党代表和队员的伙食标准一样，没有旧军队官兵长扣兵饷、吃空额的现象。铁甲车队自成立起，治军方式就与其他旧军队不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建军方面的初步尝试。

革命斗争战功赫赫

铁甲车队除执行保卫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任务外，还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先后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平定滇桂军阀叛乱、肃清反革命武装、支援省港大罢工等重大任务，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在铁甲车队执行支援广宁农民运动的任务时，周士第镇定自若地指挥作战，运用多种战术方法迫使炮楼内的地主武装投降。这一仗总共消灭反动地主武装1000多人，缴获长枪、短枪、土炮、土枪、粉炮共计2000多件，攻破了反动地主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封建堡垒——江家大炮楼和黄家炮楼。铁甲车队由此一战成名。

1925年2月1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开始向东江进军，讨伐陈炯明。驻守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趁机发动叛乱。总人数仅有一个连的铁甲车队，先是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构的重要人物过江，后又转移到大元帅府附近驻防，保护大元帅府安全。

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和刘震寰叛军。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配合东征军作战。战斗开始后，

铁甲车队在徐成章、廖乾吾指挥下，从敌军背后渡河，迅速迂回至其纵深并发起攻击。铁甲车队发挥自身防护性好、火炮威力大、机动性强的优势，不断向叛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成功掩护东征军冲锋，切断石牌、瘦狗岭、龙眼洞之敌与广州的联系，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此役，铁甲车队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俘敌数百人，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再次打出铁甲车队的威名。

1925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工作需要，抽调徐成章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由周士第接任铁甲车队队长。“五卅惨案”后，为反击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广州的大屠杀，中共广东区委调集铁甲车队的精兵强将，充实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分驻广东沿海港口，执行封锁香港、抵制英货、反对走私、维持秩序等任务。其间，周士第赴深圳发动群众，号召工农学商兵支援工人大罢工，支持封锁香港行动。在当地群众积极响应下，铁甲车队顺利完成封港任务。

1925年10月底，英帝国主义支持陈炯明、郑润琦等残部三四百人，在深圳大鹏湾一带进行反革命骚扰破坏活动。周士第、廖乾吾率领铁甲车队4个班，前往深圳沙鱼涌增援纠察队。11月4日凌晨4时，英帝国主义组织1000多人，向纠察队、铁甲车队发起猛烈攻击。纠察队和铁甲车队的战士们殊死抵抗，敌军未能得逞。铁甲车队队员乘机冲锋，击毙敌连长和排长各一人。7时许，敌军又增援百余人，敌舰士兵也同时登陆，港英当局也增派军舰和飞机前来助战。纠察队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冲锋肉搏多次，终因众寡悬殊，被迫向后路向坪山方面冲出。铁甲车队队员誓死抵抗，其中黄华然全部牺牲，周士第率另一部杀出重围。为拯救失散的战友，他们借助农民散布黄埔学生军500余人从淡水打来的消息。敌军听后十分恐慌，仓皇撤退。

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各界人民、群众团体，除举行盛大的慰劳铁甲车队伤病员活动外，还专门组织了英雄事迹报告会，周士第讲述了沙鱼涌战斗的经过和战绩。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对铁甲车队给予很高评价，号召大家学习铁甲车队英勇斗争的精神。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黄埔军校部分学员为骨干，在广东肇庆组建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34团，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至此，铁甲车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支具有新型军队特征的武装力量，虽然从组建到改组仅有一年时间，但在中国共产党尝试武装力量建设、培养革命战斗骨干、探索工农革命实践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之后人民军队的创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摘自2022年4月28日《中国国防报》）



在西柏坡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件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使用过的马褡子。这件马褡子长147厘米、宽76厘米，上有大小两个口袋。马褡子质地为粗布，原本是灰色的，历经岁月洗礼已经发白，上面还有几块用细细的针脚缝上去的补丁。

马褡子的保存者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卫士长李银桥。在转战陕北途中，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2003年10月14日，李银桥夫妇将马褡子无偿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并深情讲述了这件马褡子的来历。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边区，而在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不足3万人，敌我兵力悬殊。3月18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

毛泽东转战陕北所走之地沟壑纵横、山崩林立，地理环境异常艰险。在行军转战的日子里，这件在延安制作的马褡子一直被毛泽东隨身携带。当时，他常用的书籍、资料、地图以及生活用品等都装在里面。行军之余，毛泽东常常从马褡子里取出书来阅读。李银桥还清楚记得当时毛主席读书的情景，那沉着投入的神情，仿佛全然忘了身处敌人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

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的近一年时间里，西北人民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小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战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简称，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杨家沟，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目前形势与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党在新的形势下军事、土改、政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和政策，为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

一件珍贵的马褡子

□ 周艳芝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使用过的马褡子

利，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做了充分准备。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5月下旬，到达西柏坡。在西柏坡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马褡子“退休”了，李银桥的妻子将上面的破洞缝补好收了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李银桥将这件马褡子也带到北平。

（摘自2022年8月21日《解放军报》）

瞿秋白关注语言学

□ 刘兴尧

大家都知道瞿秋白是一位革命家，其实，他还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瞿秋白在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里的那种敢于探索、勇于革新、锋芒毕露、所向披靡的精神，显现出一个语言理论家的思想特色。

前人的经验教训启迪了瞿秋白汉语革新的思想。明朝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一卷《西字奇迹》，这是中国第一份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自此以后，为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而采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尝试，给了中国的文字学者很大的启示。

国外文字改革的经验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到达苏俄，在苏俄的几年中，他除担任新闻记者外，还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担任翻译。当

时苏俄在文改中用拉丁字母创制少数民族新文字并取得扫盲工作巨大成就的经验，深深吸引了瞿秋白。他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字怎样用拉丁字母拼写，并在业余时间做了两大抄本。

国内革命形势增强了瞿秋白文字改革的决心和使命感。瞿秋白回国以后，正值文艺界开展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开展文艺大众化，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高潮时刻。瞿秋白在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打击，转移到文化界工作以后，参与并领导了这些斗争，并配合党的武装斗争争取到了文化战线上的胜利。当时，他围绕语言文字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从而构成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2022年9月15日《人民政协报》）

1916年，父亲萧华出生于江西兴国一个贫苦泥瓦匠家庭。为了能够读书，父亲从小刻苦学习，总是考第一名，在萧氏家族奖励资助下，得以完成学业，一直到他参加红军。

参加红军后，父亲先后担任连、营、团政委，他任团政委时才15岁。16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34岁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39岁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问父亲怎样做政治工作，父亲的回答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则。”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在长征中，父亲是师级干部，部队配发了马，但骑在马上的往往不是父亲本人，而是伤病员。过草地时二师一个非常能打仗的连长周长胜负伤不能走路，父亲下令用自己的马驮着周连长走出草地。到了抗日战争时，周长胜缴获敌人一匹好马，跑了几百里地，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把马送去给父亲，父亲坚决不收，最后还是115师代师长陈光说：“老萧，你不要，我

要。”才算打了圆场。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由一群年龄不到18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武装部队）被遣散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父亲改任一军团组织部部长。由于父亲善于做思想动员宣传等工作，军团首长随后任命他带领先遣工作团随先头部队行动。从此以后，长征中任何重大军事行动，父亲始终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他亲自带领先头部队，有时作战前动员，有时会亲自吹冲锋号……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腊子口，直罗镇

战役，东征，西征……都有他的身影。

特别是彝海结盟。父亲带领先遣队和小叶丹的四叔谈判，耐心做解释说服工作，不仅说服他放弃让红军帮他打冤家的想法，还采纳了通司（翻译）沙玛尔果的建议，表示愿意和彝族首领结为兄弟。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得知谈判结果喜出望外，立即骑马来到彝海边与小叶丹歃血结盟。年仅19岁的父亲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机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成汉彝结盟，表现了他过人的才能。

长征胜利后，父亲率领二师东征，在攻打山西兑九峪的战斗中，被

敌人机枪子弹射穿大腿，负重伤。当他被战士抬上担架撤下阵地，看见后续部队四师的同志们时，满身是血的父亲振臂高呼：“四师、二师比比看，谁是英雄，谁好汉！”四师的将士们高喊着为萧政委报仇，冲进硝烟……随后，在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台、没有手术刀的情况下，军医用菜刀给父亲做手术。父亲躺在一个土炕上，嘴里咬着一毛巾，一声未吭。等手术完成后，父亲和军医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即便这样，军团首长也舍不得父亲离开部队，命令他躺在担架上继续随一军团主力部队行动。

管谁和他搭档，父亲总是挑重担，把战场准备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思想工作、部队和地方的人员与协调工作甚至干部家属工作，全部一肩挑，默默干活，有了错误自己承担，有了成绩归功于他人，而让军事主官一心一意考虑作战计划。

父亲过世后，萧劲光伯伯流着眼泪对母亲讲：和老萧（指父亲）共事的那几年，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愉快的几年。所以当父亲所在部队要“分家”时，领导们都会抢着要父亲。

（摘自2017年第7期《文史博览》，原标题为《睡在毛主席床边的“小老表”——回忆父亲萧华》）



父亲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不